

春秋文丛

第一辑

百年寻梦

傅国涌历史随笔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用现代眼光审视历史
以历史经验烛照现实

百年寻梦

傅国涌历史随笔

盛世网闻

牧 惠历史随笔

天下乱弹

宋志坚历史随笔

ISBN 7-211-04706-2



9 787211 047062 >

ISBN7-211-04706-2

K·385 定价:18.00 元

百年寻梦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傅国涌历史随笔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年寻梦/傅国涌著. —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
2004.5

(春秋文丛)

ISBN 7-211-04706-2

I. 百... II. 傅... III. 文化史—中国—清后期~
民国 IV. K252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4594 号

百年寻梦

BAINIAN XUNMENG

作 者: 傅国涌
责任编辑: 施国忠
出版发行: 福建人民出版社
地 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
电 话: 0591-7533169 (发行部)
印 刷: 福建屏山印刷厂印刷
地 址: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
开 本: 850mm * 1168mm 1/20
印 张: 10
插 页: 3
字 数: 185 千字
版 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数: 1-2000
书 号: ISBN7-211-04706-2/K · 385
定 价: 18.00 元

电子邮箱: 211@fjpph.com
网 址: <http://www.fjpph.com>
邮政编码: 350001
邮政编码: 350003

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目 录

【第一辑】

- 1912年：梁启超在北京的演讲 (3)
- 中国记者笔下的巴黎和会 (12)
- 1933年：“新年的梦想” (19)
- 1933年：《东方杂志》的宪法讨论 (29)
- 鲁迅逝世之后 (40)
- 1944年：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延安
——读赵超构《延安一月》 (44)
- 竺可桢在费巩“失踪”之后
——读《竺可桢日记》 (50)
- 百年寻梦
——重读章乃器和王芸生的梦 (57)
- “清算豪门的时候到了”——读重庆《世界日报》 (62)
- 傅斯年的泪为何而洒？ (66)
- 黄炎培：从“傲尽风霜”到“改造作新人” (69)

【第二辑】

- 蔡锷与袁世凯 (75)
- “三怪杰”与“三小人” (80)
- 胡政之与1916~1920年的《大公报》 (84)
- 《语丝》与《现代评论》
——以“三一八”事件发生后为例 (98)
- 戈公振与《中国报学史》 (108)
- 从胡适与胡政之的通信说起 (114)

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蒋介石 ——读《何廉回忆录》	(12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【第三辑】

沈曾植：“不知何处是故乡”	(127)
辜鸿铭：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	(134)
冯自由：“白头宫女谈天宝”	(141)
千秋功罪：话说周作人	(148)
蒋梦麟：“临难毋苟免”	(159)
王云五：“牛马骆驼之精神”	(166)
王世杰：呼唤法的精神	(175)
蒋廷黻：“开山的人”	(182)
叶公超：一道已逝的风景线	(189)
后 记	(195)

1912年：梁启超在北京的演讲

诚如郭沫若 1928 年在《少年时代》中回忆梁启超时所说：“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，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、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，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。20 年前的青少年——换句话说：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——无论是赞成或反对，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。”^① 从《时务报》到《清议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，在 19 世纪末、20 世纪初的长夜里，梁启超以他富有才情的清新笔调、振聋发聩的思想，有力地冲击了昏睡的老大民族，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。

1912 年 9 月，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 15 年的流亡生涯，离开日本神户，返回祖国。10 月 20 日，他由天津赴北京^②，在贤良寺小住 12 天，各界欢迎，“举国若狂”。在这短短的 12 天中，他马不停蹄地在各种欢迎集会上发表演说，从各政要、参议员、各大政党到北京大学校，从学生、同乡到商会，乃至佛教会、八旗生计会等无不对梁启超的到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，而他确实也是知无不言，言论风采一时倾动都门，盛况空前。他的思想穿越了历史的茫茫时空，90 多年后重读他当年的演说词，我依然感到强烈的震撼。

—

梁启超到京 12 天，各界欢迎实在应接不暇，所以在离京前夕，10 月 31 日他专门在湖广会馆召开一次茶话会，以答谢各界代表。出席的有各报记者、各党派干事、蒙古王公、商界代表、

① 郭沫若：《少年时代》，112 页，北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9。

② 丁文江、赵丰田编：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651 页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。下同。

北京市民代表、佛教会代表、军警两界要人等五六百人。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中，他尖锐地指出：时至今日，一个极为可怕的现象，就是惰力性的渐渐发生。他说：“鄙人十余年来，持乐观主义之一人也。返国以来，考察国中政治、财政、外交，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，衷心未尝不为之悚惕。然鄙人之所大惧者，并不在制度、文章，而在人心、风俗之微。”^①

他将当时国人心理分为三类：一类是以为中国既然挂上共和的招牌，从此就可以与世界抗衡；一类以为经过如此大变，外人尚且没有干涉，日积月累，自然能进入开明之境；一类则以为大局已定，只想谋一个位置以自安。之所以导致这样的心理，都是“由于苟安之意多，而忧危之意少”，也就是他所说的“惰力性”在发挥作用。

面对上述三类心理，他在民国元年就发出了“中国前途，乐观乎，悲观乎？”的疑问。

他分析：“鄙人于万事悲观之中，默察近十余年风气变迁之潮流，及国人心理之趋向，则知吾国人具有一种特质，即好善而能虚受是矣。”饱经世故的上流社会，一切都以不动摇、不损害自己的个人利益为前提。大多数国民面对国际的竞争和国内的变更，“则不移时而靡然从风，举国一致”，武昌枪响，东南响应，没多久即民国告成，就是国民“好善而能虚受”的特质所致。这既是优点，也是弊病。“轻躁喜动，乏抉择之力，一也；暂动又止，不能为继续秩序之进行，二也。”凡是一种国民的运动，开始“未尝不见效”，但对于社会及政府的根本改造，不能发生根本性的影响，就是因为有此二弊。梁启超因此提出“天下之事，决非旦夕所能告成，而于提倡风气为尤甚”，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个目标，“日之不足，继之以月，月之不足，继之以年”^②，如果不是一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，那就合一团体的力量进行，假以时日，又何愁没有健全的国民作为国家的柱石。对于国民的政治知识、政治能力、政治兴味加以根本的促进，这是先知先觉者应有的责任。

实际上，这也是梁启超一生言论事业的目的所在，他在回国

^{①②} 《梁启超全集》，第4册，2532页、2533页，北京，北京出版社1999。

之初的报界欢迎会上说得很明白，立言的宗旨，就在于开启民智、薰陶民德、发扬民力，目的在于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的资格，这是他 18 年来的初衷，也是他终身为之努力的理想。

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、革命志士不同的是，梁启超透过纷乱的社会现象，看到了中国症结之所在，往往一言中的，如他当年在《新民丛报》与《民报》论战时所提出的共和之后的乱象，不幸而被以后发生的历史所验证。1912 年冬天的中国，一切仿佛都是新的，一切都有了好的开头，共和告成、举国沉浸在一片乐观气氛之中，他却没有盲目乐观。尽管在 11 月 1 日写给女儿的私人信件中，他对自己在北京 12 天所受的空前欢迎——“如众星之拱北辰”，表示了极大的欣喜，称之为“极人生之至快”^①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对国民的冷静观察、分析，透过林林总总、错综复杂的现象，他看到了初生的民国的危机，看到了国民心理的缺陷，他深切忧虑“并不在制度、文章，而在人心、风俗之微”，他一再忧心忡忡地告诫人们从提倡风气入手，持之以恒，最终造成“健全之国民”。他念念不忘“新民”理想，对他来说，从“新民”到“健全之国民”无疑是一脉相承的。

二

在进京后第一次欢迎会上，面对故旧新知，梁启超动情地指出自己出国 15 年来，从物质到精神，中国的变化远远超过了 150 年。一部中国史从秦汉到清末，两千年只是“立于不进不退之域”，直到戊戌变法以后的 15 年，才由静而动，终于有了辛亥年的重大转型。在掌声、鲜花的包围中，他的个人前途似乎也一片光明，有过 15 年流亡经历的梁启超却没有被这一切冲昏头脑——“所虑者，吾国人之惰力性，受诸先天而不易拔，事过境迁，遽复其旧”。^②

他归国不久，就已敏锐地感到“此惰力性已渐渐发现而侵人于多数人之心”，其中乐观的人认为经此变革，国家自然会太平，不再有什么忧危，因而终日为私事忙碌、奔波；悲观的人则认为

^① 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656 页。

^② 《梁启超全集》，第 4 册，2511 页。

“纪纲法度，废坠至此，人心风俗，败坏至此，陆沉在即，无复可救”，同样放任不顾国事。针对根深蒂固、仿佛“先天”的“惰力性”，他对“国中贤者”提出要有“责任心”和“兴味心”。“责任心”众所周知，他未做解释，只是现身说法、重点阐述了对“兴味心”的见解：“鄙人自问生平无他异人处，惟对于一切事，皆觉兴味浓挚，求学有然，治事亦有然，凡有可以劳吾心、劳吾力者，则当其服劳之时与既劳之后，皆觉有无限之愉快，至于其勤劳所得之报酬如何，则不暇问也，以故亦永无失望沮丧之时。”他说：“吾辈无论欲为何事，必先有兴味，然后有精神，必自有精神，然后能引起他人之精神，精神贯注，何事不成？”^①

在他看来这是打破“惰力性”的前提，如果连仁人志士都普遍厌世，缺乏“责任心”和“兴味心”，则整个国家、民族就无可救药了。他举英国为例，其人缘、气候、地理、人种、遗传造成了英国人好活动的天性。政治活动在他们而言也是一种竞争性的娱乐，可以乐此不疲。所以其他国家的政治家，失败之后意气消沉，英国人则无论胜败都泰然自若。其中既有他们的“责任心”，更有他们的“兴味心”，这正是实行了两千多年专制政治的中国所缺乏的，并不是有了“制度”、“文章”就会自动解决，“人心”、“风俗”或者说风气的培养不是一代人即能完成的，梁启超作为思想家深刻地看到了这些问题。

三

梁启超虽自言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（龚自珍语），实际上从湖南长沙时务学堂，到讲学于日本东京，他的及门弟子中出了不少显赫的历史人物。当年的莘莘学子会聚北京，欢迎他们所敬重的老师，梁启超感慨万千，他想到了昔日的同事谭嗣同、唐才常两位英烈，想到了与唐才常一起殉国的那些学生，也想到了远在云南的蔡锷。10月23日，当他与学生在北京重逢，欣喜之余，他无比沉痛地说：

中国社会，最易消磨人物，而斫丧其英气，自昔有然，今则尤甚，鄙人归国旬余，感此污浊之空气，已在在觉其可

^① 《梁启超全集》，第4册，2511页。

危。苟非有自克之毅力，常抵抗社会之恶潮流，则入而与之俱化，《孟子》不云乎，我犹未免为乡人也，是则可忧也，己不自立，遑语于立人……吾侪若能常念昔日同学为国牺牲独立不惧之精神，庶乎可以告无罪于天下耳。^①

他之所以谆谆告诫学生“自立”，然后“立人”，也就是要他们负起“责任心”，“抵抗社会之恶潮流”，不被恶浊的社会空气所同化，在“最易消磨人物”的中国社会保存元气、坚持理想，这番话由于是对及门学生所说，因此显得亲切、感人。事隔90多年，仿佛梁启超音容宛在。

他在北京大学校的演讲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。一代言论界骄子，自主笔《时务报》以来，他的文章曾倾倒了千万国人，国人无不想望其风采。他此次进京，正值北京大学校学生闹学潮，罢课学生甚至请愿要梁启超当校长。他在10月31日的演说中指出，“普通学校目的，在养成健全之人格与其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”，大学的目的则在其普通目的之外，还有特别的目的，而不仅是程度的差异。这特别的目的就是“研究高深之学理，发挥本国之文明，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”。他区分了专门学校与大学的不同，“专门学校之精神，在实际之应用，而大学校之精神，则在研究与发明”。他认为学问是文明之母、幸福之源，一国的大学，就是一国文明幸福的根源，“其地位之尊严，责任之重大”，又岂是语言所能穷尽的？“保持大学之尊严，努力于学问事业”是他对北京大学校学子的谆谆期望，为此他猛烈抨击“令人痛恨不已”的“前清学制之弊”，特别是“误国最甚”的“奖励出身之制”，“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，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，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”。^②他指出前清学制最大的危害，就是让学生只把求学作为当官的终南捷径，只知道当官，而不知学问为何物。

在这番讲话中，梁启超之所以一再强调“大学之尊严”、“学问之神圣”，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学问（或者说学术）的独立性，只有学术独立，不依附政治权力，才有可能求得真学问，养成真正健全的人格，造就一代新型知识分子。他殷殷期望北京大学校的学生“以学问为目的，不当以学问为手段”，在学问目的之外，

^{①②} 《梁启超全集》，第4册，2519、2527~2529页。

别无其他目的，才不愧为大学生。如果在学问目的之外，另有其他目的，那就是亵渎学问的神圣，伤害大学的尊严，又怎么能称之为研究学问？他期望北京大学学生的只是——“为我中国学问之前途争光荣”。

他提出的这些见解旨在打破自古皆然的“读书做官论”，破除千年积习，重塑民族精神。在蔡元培入长北京大学之前，还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达到过这样的境界。他的见地今天看来或许已不算什么，但要真正做到，又谈何容易。

四

10月30日下午，在北京公民会和八旗生计会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，梁启超谈到了他对“平民政治”的“特别感想”，他说共和国以公民为基础，从大总统、国务员到其他公职，都“不过一机关而已”，全国的主人翁，实际上是公民。公民对于共和国，其责任之重，远非君主专制国的人民可比。过去总是依赖一二人，大多数人置国事于不问，现在的国家大政，“因全国公民之意思而决，此公民之地位所以为神圣也”。但公民要保持这一神圣地位，第一要有关于国家及世界大势的知识，第二要有强国独立的志气。^①

自投身报界以来，18年中，梁启超手创的报刊就有7种，其目的无非都是为了这两点。偌大中国由两千年专制一跃而进为共和，专制下的臣民一夜之间成为共和国的公民，要真正来一次脱胎换骨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，但不能因此否认开风气之先的一代思想巨人提出这一理想的意义。

在京12日，各大政党争相集会欢迎，兴奋之中的梁启超知无不言，就宪政民主、政党政治等提出了他的独特见解。在10月20日的共和党欢迎会上，他指出近代各国政体虽各有特色，“而其大原则不出二者：一曰政治之公开，二曰政治之统一”。他不同意近代学者关于“立宪政治”就是“国民参政之历史”的说法，认为政治参与“不过立宪政治之一种特色”，其他如预算公布、法律公布、行政手续公开、法庭公开等也都是其特色，所以

^① 《梁启超全集》第4册，2523页。

还不如说立宪政治首先是“政治之公开”。一国政治要上轨道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开主义，“而秘密之习一日不革，则政治一日不能改良”。^①

面对民国元年政党蜂起、小党林立的局面，他寄望于早日进入“大党对峙之正轨”。在他看来各党虽各有党义，表面上是对立的关系，但既然政党都以国家为前提，政治上尽可相互竞争，同时应保持对其他政党的尊重。这些观点在西方文明国家早已是常识，对一个党同伐异的民族而言却是新鲜的。

10月22日，民主党在湖广会馆召开全体大会欢迎梁启超，各党来宾济济，梁启超登台演说达3个小时，“闻者莫不动容”。这次演说的重点就是谈政党政治，当时外国有种舆论认为中国人没有运用立宪政体的能力，推其原因，“中国人之性质，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”。虽然他承认“组织政党为一至难之事”，但他还是殷切期待着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党，“以雪此辱”。为此，他提出了政党的六条“模范之标准”：

（一）“凡政党必须有公共之目的”。政党不是合无数私目的而成的，政党存立的根本要素是党员排除个人的私目的，而服从政党的公目的。反观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，梁启超“为之慨然”，“分明政见不相同，而居然可以同党，分明无意识之人，而亦居然加入党中”，这种结合不可能基于公共目的，要之，不过是私目的罢了。就算组成政党，最终也必分裂，长此以往，他担心有一天四万万人就有四万万个小党，而真正的政党则永无成立的希望。

（二）“凡政党必须有奋斗之决心”。他比孙中山更早提出“先知先觉”、“后知后觉”的概念。“先知先觉之所以有益于国民”，靠的就是“奋斗之力量”。政党的活动，除了奋斗之外，别无其他途径。如果朝三暮四，往来于各党之间，只求满足自己的私利，无所谓主义的奋斗，又怎么可能成为政党？人世间最可耻的，莫过于服从强权，数千年来国人恰恰有这样的恶性，这是中国长期处于专制政治之下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。如果这一恶性不除，直到地老天荒，恐怕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好政治：他尖锐地指出，只要这服从强权的恶性不除，中国将在暴君政治、暴

^① 《梁启超全集》第4册，2512~2514页。

民政治之间循环不已。真正的党员，为天下的公理而奋斗，为国家的大计而奋斗，为一党的主义而奋斗，为一己的信念而奋斗，“成功固得行其所志，为国谋进步，为民谋幸福，即失败至无余地，亦为最有名誉之失败”。

（三）“凡政党必有整肃之号令”，否则不过是一团散沙，遑论政治上的奋斗。

（四）“凡政党必须有公正之手段”，“譬如演说、办报、游说，皆政党所用之公正手段也，若阴谋诈术，则非政党所宜用矣”。尽管他深知，对一个被专制毒化了数千年的国度而言，欲求政治上的“公正之手段”，几乎是难于上青天。

（五）“凡政党必须有牺牲之精神”。他说大政治家“须有道德气魄，身命名誉皆可牺牲，独主张不可牺牲，因主张之不可牺牲，故不可不有牺牲之精神”。政党出入自由，“党员合则留不合则去，本有自由之权”，这不是“专制强迫”。

（六）“凡政党必须有优容之气量”。政党之间要有“优容之气量”，虽各自的主张不同，但都是寻求国民同情以谋政治进步。党员之间也需要“优容”。这在常常“杂以私见”的中国尤其缺乏。^①

梁启超提出的六条标准中，最富有启发的是四、六两条，也是最难达到的。但不管怎样，作为思想家，他提出了问题。

五

在北京“极人生之至快”的12天中，梁启超曾发表大量演讲，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方面，概而言之，他表达了对中国前途的深切忧虑，他流亡异国15年，接触了先进的西方文明，同时熟悉中国历史，对中国现实有着深刻的了解，即使在“满城争看梁启超”的那个冬天，他也不感到乐观。这绝不是他的危言耸听，归根结底就是要老大中国摆脱“私目的高于公目的”、“趋附强权”、“治乱循环”的旧格局。他关于“大学之尊严”、“学问之神圣”的阐述，他对“平民政治”的理想，他对中国社会“惰力性”和“最易消磨人物”的判断，他对政党政治的

^① 《梁启超全集》，第4册，2514~2518页。

见识，他所耿耿于怀的“并不在制度、文章，而在人心、风俗之微”，他提出的“责任心”和“兴味心”，这一切都没有过时。思想超越时空，以后的历史证实了梁启超的忧虑并不多余。

中国记者笔下的巴黎和会

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，1919年1月，战胜国在巴黎召集和会。中国因为搭上了参战的末班车，才有机会以三等国资格派代表参加这一盛会。其时，各国记者云集巴黎，美、英等国有200多人，日本也有30多人，中国以纯粹新闻记者资格前往采访的惟有天津《大公报》胡政之一人。他于当年1月23日到达巴黎，25日大会开幕，直至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，他亲历了和会的全过程，以一个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，见证了那一幕重大的历史。他发表在《大公报》的《巴黎特约通信》也因此而有着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，但至今未引起历史学家足够的重视，未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

—

在胡政之笔下，几个中国代表莫不形神毕露——

中国政府“所派五专使固极一时外交人才之选”，“然陆徵祥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；王正廷悃悃无华而远于事实；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；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；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”。

中国驻外使馆的腐败更让胡政之愤恨不已。驻法公使胡维德在法国5年，平时最怕见外国人，丝毫不与外国人交际，除了每年国庆节使馆开一茶会招待本国留学生外，他绝不宴请外人，外人也很少和他交往。他要到法国外交部办事，只与一般科员接洽，不要说见总长、次长，连见司长、科长都不容易。外交部之外那就更为隔绝。所以他驻法5年，法国新闻界中有些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使馆中人向记者透露，他这样做，每年可节省

10万法郎。驻英公使施肇基也如出一辙，都是“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”，根本谈不上什么外交。他们个人自以为得计，国事则深受其害。欧洲人对中国之事茫然无知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驻外使节平时与外人的隔绝。这次世界大战，欧洲战场上华工不下10万人，中国出兵海参崴，保护中东路也都有功绩，却被列为三等国家，外交官的腐败无能也是重要原因。1920年，胡政之回国后，在上海报界欢迎会上说，此行感触最深的两点，其中之一就是外交官的腐败为我们意料所不及，必须大加改良。

出席巴黎和会的首席专使陆徵祥“受政府之重托，为人民所属望”，由于“才具太短”，加上人才缺乏，随员中都是“九等以下人才”，到了法国后才匆忙从中国驻欧洲各使馆中调用多人帮忙，“亦无特出之士”。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“才华卓然”，是公使中有数的人物，也是陆徵祥以往所信任的，本可让他担任秘书长，可惜陆徵祥为了敷衍胡维德，而起用了一个办事极为紊乱的驻法使馆秘书，用人不当导致笑话百出。

最后，因为代表席次问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陆徵祥路过美国时邀请王正廷同行，“许以第二席之专使”。到法国见到施肇基，“又许以第三席之专使”，并通告了和会。结果政府明令发表却是顾维钧第二、王正廷第三、施肇基第四，陆徵祥因此陷人尴尬。施肇基不愿居顾维钧之下，顾维钧也因有人要他让位于王正廷而大愤，提出辞职。最后，陆徵祥竟于3月7日独自从旅馆出走，到了瑞士，并向政府提出辞职。闹了一个更大的笑话。

胡政之慨然说：“中国人办事，两人共事必闹意见，三人共事必生党派。”

二

巴黎和会由美、英、法、意、日五强国主导，其中只有美国能为弱小国家“说话”，在5个强国中显得孤立。“美国对于我国尤为挚厚”，比如和会设5个分科会，5个强国各派代表2名，另外到会的19个国家一共只能选出5名代表，由于威尔逊预先示意南美各国帮忙，中国代表顾维钧、王正廷才得以当选分科委员会委员。在胡政之笔下，威尔逊的演说“声调之优美，态度之